

意义问题：20 世纪中期以来建筑理论的一条线索

The Question of Meaning: A Theoretical Thread in Architectural Theories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青 锋

QING Feng

摘 要：20 世纪中期以来建筑理论进入多元发展时期，大量新的观念与思潮不断涌现，如何分析这一复杂的理论图景成为当代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提出，可以使用“意义问题”这一线索将这一时期一些主要的理论思潮串联起来，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新经验主义到 21 世纪初的非参照建筑等诸多理论流派，都以不同形式参与到“意义问题”的讨论中。文章分析了这种讨论是如何深入和演化的，解析了不同流派的立场，并且论述了各个流派基本理论基础之间的关联。最后，从现象学的视角讨论了“意义问题”能够成为这一线索的理论根源，并且对近期内可能到来的新的讨论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建筑理论；意义问题；回归；质疑；还原

Abstract: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architectural theory has experienced a remarkable proliferation of diverse ideas and emerging trends. This diversity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scholars seeking to navigate this intricate landscape.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question of meaning” serves as a unifying theoretical thread, linking several prominent theoretical currents during this period. Various architectural schools have engaged with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question of meaning” in distinct ways, spanning from the New Empiricism of the 1940s to the Non-Referential Architecture of the 2010s. This paper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is discourse, elucidating the positions adopted by different schools and highlighting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t concludes by undersco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hread with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theories, particularly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anticipates the prospects of a forthcoming wave of debate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architectural theory; question of meaning; return; challenge; back to origin

【文章编号】2096-9368(2023)04-0120-08

【中图分类号】TU-091

【文献标识码】A

【录用日期】2023-08-29

【作者简介】

青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外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任何历史研究都要面对如何在庞杂的历史现象中选择讨论对象的问题，因为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事物展开讨论，那么如何选择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方法论问题。一种简单的解答是，研究者只会讨论与某个历史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现象，放弃那些无关或者不太相关的人和事。历史问题帮助人们在难以穷尽的过往事件中选择特定的现象，以有组织的方式展现现象之间的关联，帮助理解特定的人、群体与事件背后的内在机制。

建筑理论史研究也面对类似的挑战。宽泛地说，任何关于建筑的思考都可以被划入建筑理论的范畴。它不仅仅局限于特定理论家的著书立说，也涵盖了建筑师、业主、使用者、旁观者等各色人物的观念与思索。对这样庞大的领域进行历史研究，仍然只能依赖于对特定历史问题的选择与限制。这样才不至于湮没在浩若繁星的概念、原则与体系之中。

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建筑理论史研究来说，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这是因为这段时期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建筑理论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大量的新观念、新思路、新的理论表述在这一时期涌现，使得整体性的理论图景变得极为错综复杂。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理论现象复杂性的认知，最直观地体现为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所编纂的建筑理论图表，数以百计的人名与概念被纳入一个图谱之中，仿佛一片汪洋，令很多试图了解当代建筑理论的人望而却步。另外一个例证是一批重要的当代建筑理论文集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比如琼·奥克曼（Joan Ockman）与爱德华·艾根（Edward Eigen）编写的《建筑文化1943—1968：一部记录文献集》（*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A Documentary Anthology*）出版于1993年，凯特·内斯比特（Kate Nesbitt）编辑的《建筑的新理论议程，1965—1995年之间的建筑理论文献集》（*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出版于1996年，查尔斯·詹克斯与卡尔·克罗普夫（Karl Kropf）共同编纂的《当代建筑的理论与宣言》（*Theories and Manifestoes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出版于1997年，迈克尔·海斯（Michael Hays）编纂的《1968年以来的建筑理论》（*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于1998年出版。如果不把它们相近的出版时间看作纯粹巧合的话，这或许可以作为学者们这一时期理论发展的反映。詹克斯的图表中那些独立的单词，化作整篇或者片段性的文献，以超乎寻常的体量呈现在读者面前。

如何处理这样的复杂性，构成了建筑理论史与当代建筑理论研究中的重大挑战。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在实践界，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许多人对于这一时期建筑理论的困惑。如果不甘于被詹克斯所标定的上百个理论分支彻底吞噬，就需要在极其复杂的理论现象中进行选择与组织，依赖特定的问题来给予划分与阐释。即使这不足以彻底驱散当代理论的迷雾，也至少可以摸索出一条在迷雾中前行的可能路径。

这也是本文所想要尝试的，笔者试图论证，可以用“意义问题（question of meaning）”作为线索来串联和组织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些重要建筑理论思潮，使得它们不再是互不关联的独立个体，而可以在一个相对简单和清晰的体系中找到定位。下文将首先对什么是“意义问题”给予解释，然后简要说明这一问题在此前建筑理论史中的体现，以及一些主要的理论思潮如何与“意义问题”产生关联。最后，试图从哲学层面论证将“意义问题”作为理论线索并不是一个随意的选择，而是具备某种必然性与合理性。

1 意义问题的内涵与早期历史

意义问题的核心当然是“意义（meaning）”这一概念。虽然是一个常用词语，但“意义”在现代哲学中是一个关键性概念，叔本华、胡塞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都对其发表过重要的论述。对意义问题的探讨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与此前哲学讨论产生关联，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在这里就转向哲学讨论，而是将其放在文章末尾，在解析了相关建筑现象之后再给予论述。首先，只需要从最普遍的日常理解开始，也是在建筑理论中最常出现的一种理解，其中“意义”就是指被表达和呈现的内容，比如说一个事物具有意义就是说一个事物会表达和呈现某种内容。对于建筑来说，具有意义就是说建筑可以表达和呈现某些内容。而所谓的“意义问题”就是指对于建筑具有意义这一现象的探讨，它可以涉及建筑是否需要传递意义，建筑如何传递意义，以及建筑可以传递什么意义等问题。

以这些问题为准绳，可以看到，意义问题在传统建筑理论中的存在由来已久。比如在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十书》（*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中就有很多相关的论述。在第一书第一章中，维特鲁威提到女像柱（Caryatids）是为了表现古希腊城邦卡亚（Caryae）中的女性因为城邦背叛了希腊联盟而不得不负重受罚的主题，这样此后的世代都能够由此获得警醒。^{[1]22}在关于柱式的论述中，维特鲁威也认为多立克神庙表现了男性人体的比例，而爱奥尼柱式不仅展现了女性的身体比例，柱身上的凹槽还是对女性长袍中褶皱的模仿。^{[1]55}总体看来，维特鲁威毫无疑问地认同建筑应当传递意义，而可以传递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宇宙秩序（cosmic order），这主要体现在对比例的强调之中，比如上面例子中对人体比例的借鉴，其根源就在于人体比例实际上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和谐比例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比如对卡亚女性的惩罚，以及神庙的石质构件对早期木质构件的模仿，这些更多地来自于传统习俗与社会组织体系，而不是先天的宇宙原则。维特鲁威使用“适宜（decor）”一词来描述后一种关系，建筑不仅要满足功能与结构上的合理性，还应该呈现出这种“正确性”，所以城市住宅与乡村住宅、借债者与执政官的住宅应该有不同面貌。^{[1]26}

在文艺复兴建筑理论中，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仍然

① 但今天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维特鲁威对女像柱的阐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是两个主要的建筑表现内容。在《论建筑》(On the Art of Building in Ten Books)中,阿尔伯蒂(Alberti)谈到有两种品质帮助人获得最为理想的存在,分别是“美德(virtue)”与“真理(truth)”,^{[2]127}这两者可以大致对应于上述的社会秩序与宇宙秩序,阿尔伯蒂的建筑理论也强调了对这两者的表现。前者可以通过图像、雕塑、几何图案,以及特定建筑元素比如柱式与山墙表现,而后者则是依赖比例以及圆形、方形等理想几何构型来呈现。对于这些具有古典思想特征的理论家来说,无论是宇宙秩序还是社会秩序都具有某种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因为它们都直接产生于古典的形而上学秩序。而人作为这一秩序中特殊的一环——具有理性思考与认知的能力——会主动模仿和理解这一秩序,也就是古典艺术理论中的“摹仿(mimesis)”原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摹仿”是人内在的特性,通过这一途径,人得以超越其他生物,获得对事实的理解。^{[3]33}

不难想象,一旦这种古典形而上学秩序的观点被动摇,那么建筑所能传递的意义也会受到影响。17世纪克劳德·佩罗(Cloude Perrault)对古典比例理论的质疑,实际上就是传统宇宙秩序观念崩溃的产物,建筑比例来自于习俗而不是天体的运行规律。所以,传统建筑表现内容中,仅有社会秩序这一方面的内容得以延续,18世纪法国建筑理论中的“话语建筑(Architecture Parlante)”理念所强调的就是展现建筑自身的个性,而所谓个性,主要是指其建筑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建筑不仅应该呈现其核心功能,还应该展现这种功能的社会价值,比如法院的威严与公正。

对社会秩序这一意义内涵的强调进一步延续到19世纪的各种复兴主义中。一种特定的风格,无论是希腊、罗马风还是哥特,被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内容的代表,可以指代国家文化的源泉,比如英国议会大厦对哥特风格的采用,也可以指代社会理想,比如美国政府建筑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实际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传统建筑中对社会秩序内涵的意义传递一直是最重要的建筑主题之一,这当然与传统社会中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有直接关联。

这一延绵已久的意义传统在现代主义时期受到巨大的挑战。古典的宇宙秩序观点早已被抛弃,在世纪之交的剧烈变革中,传统的社会秩序也不再具有权威。对于先锋建筑师来说,摆脱这些传统意义的束缚意味着自由与解放,可以重新探寻建筑的基础。无论是美国的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还是荷兰的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都鲜明地反对利用历史风格或者具象的绘画与雕塑来呈现特定内容,他们提出以新的表现内容来替代传统的表现内容。对于沙利文而言新的内容是建筑自身的活力,比如摩天楼向上攀升的意志,^{[4]206}而对于凡·杜斯堡则是抽象的时空关系。^{[5]189-190}但是在一些更激进的建筑师眼中,甚至是这样新的表现内容也是不恰当的。比如ABC团体认为风格派对关系的表现仍然只是形式主义,建筑核心问题是功能与经济,而不是表现。这种实用性的强调实际上是基于机械论的立场,认为所有规律都可以由具有因果关系的数量来定义,至于这种关系是否需要表现和认知

并不重要。因为人本身也被理解为机械性因果关系的一环,其认知诉求并没有绝对的价值,反而是其可以被量化、被机械性因果关系所满足的需求,比如房间大小、亮度、温度才被视为建筑合理的关注。

不可否认,现代主义运动中很多建筑师仍然坚持建筑意义传递的重要性,比如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对精神意志的技术性表现。但是在总体上,由机械论所驱动的理性主义仍然对传统建筑理论中意义传递的观点给予了沉重打击。无论是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新建筑五点”还是在《国际式风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中,都看不到对建筑意义传达的肯定。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在著名的《装饰与罪恶》(“Ornament and Crime”)一文中提出,利用装饰来表现自身的个性是一种原始的做法,而现代人已经足够成熟和微妙,^{[6]105}内心也足够丰富和充实,不再需要外部的装饰表现。他的这一论述被一些现代主义支持者们曲解为“装饰就是罪恶”,推动在新建筑中去除具有符号特征的传统装饰,这对于现代建筑剥离传统表现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对于某些特定的建筑师,现代主义建筑语汇仍然可以成为意义内涵的载体,而且就像科林·罗(Colin Rowe)所分析的,即使是勒·柯布西耶的纯粹主义建筑语汇其实也蕴含着对“现象性透明”的暗示,^[7]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所熟悉的、充满了传统意义内涵的建筑元素在短时间内被现代建筑的抽象元素所取代,就意味着对建筑常识性内容的剥离。从古典时代一直传承下来的建筑的意义表达,在现代主义时期第一次受到了全面的挑战。机械论理性主义在因果关系下的必然性作用,取代了建筑的表达与认知,在主流现代主义对意义表现的质疑背后,实际上是现代社会对人自身特性的认知变化。

2 意义的回归

虽然在现代主义发展的盛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与压制,但意义问题很快就在战后的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会议中再次浮现出来。在英国现代建筑研究组(MARS)的推动下,“当代条件对建筑表现的影响”成为在英国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召开的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六次会议(CIAM6)的主要议题之一,并且成立了一个分委员会讨论“建筑表现”问题,《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的主编J·M·理查兹(J. M. Richards)和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理查兹强调要“让功能主义的美学表现更为人性化”,^{[8]296}他极为推崇的是瑞典的“新经验主义(New Empiricism)”,实际上就是在主流现代主义之中加入更多的乡土建筑元素,比如不规则外形、红砖墙、坡屋顶、木门窗等。这些传统住宅元素能够更为有效地传递家的意义内涵。吉迪恩同样关注建筑表现,早在1943年他就与约瑟夫·赛特(Josep Lluís Sert)和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一同发表了《纪念性九点》(“Nine Points on Monumentality”)一文,提出纪念性建筑是“人类理想、目标与行动的象征”,是“人类

最高文化需求的表现”，它们应当展现“人民这一集体力量的感受与思想”。^{[9]30}虽然并不赞同回到传统的历史主义纪念性语汇，吉迪恩等作者仍然支持用新的建筑手段来传递这些内容。1944 年，在美国的路易·康（Louis I. Kahn）也发表名为《纪念性》（“Monumentality”）的文章，他此后的作品，比如萨尔克生物研究所杰出地展现如何使用当代建筑手段来实现纪念性表达。尤其特别的是，康的思想有强烈的古典特征，他所表达的最核心的主题仍然是“秩序（order）”，这使得他的作品反而更为接近古典的“摹仿”理念。

意义问题在荷兰建筑师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的论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十小组（Team X）”的核心成员，凡·艾克在 CIAM 末期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另一种理念的故事》（“The Story of Another Idea”）等文章中，他激烈批评了 CIAM 的机械理性主义倾向，认为建筑应该与其他艺术一样，展现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他还借用了非洲“多贡人（Dogon）”的村庄与建筑加以说明，“多贡人依赖一个涵盖了一切的框架，它包含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物质、情感以及超验”，^{[10]192}“每一个房屋、街道、广场、物品、姿态、声音以及歌曲都在这个互动的巨大框架中具有特定意义，这个框架实际上对应于参与社区的物质与精神现实，对应于整个村庄的形态”^{[10]184}。凡·艾克认为，正是这种来自于整体框架中的意义，让建筑与村庄成为多贡人真正的家园。所以，今天的建筑仍然应该追寻类似脚步：“我们应该完成的是建造意义（meaning）。所以靠近意义并且建造！”^[11]凡·艾克在这里所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建筑所表现的东西，也指代了生活的价值与目的。他的建筑思想实际上有很强烈的现象学倾向，下文将再次谈及这一点。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意义开始成为建筑理论中最重要的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现代主义的批评逐渐扩散，对现代建筑缺乏可以被大众理解的表达性内容的不满日益提升，建筑师们开始更积极地接受那些具有明确意义内容的建筑元素，比如来自于历史传统中的具有特定内涵的元素。另一方面，语言学（Linguistics）与符号学（Semiotics）研究的兴起也更多地渗透到建筑理论中。在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教程启发下，符号学理论开始扩展到语言学之外的领域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在自己所专注的领域中意义是如何被传递的，一系列新的观念与思想成为了新理论的源生动力。

在前一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学者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与美国学者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66 年，他们的著作《城市的建筑》（*L'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与《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分别在意大利和美国出版。这两本书在现当代建筑理论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鲜明地对现代主义的机械功能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都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理论。对于罗西来说，主要是使用传统类型，而对于文丘

里来说，是使用建筑中已经存在的常规元素。这两种路径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传统类型与常规元素都有明确的表现性内容，凭借它们，建筑可以传递丰富的内涵。

早在 1966 年之前，类型已经成为意大利建筑界的重要议题。在恩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与朱利奥·卡罗·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等人的推动下，意大利建筑界重新将视线从战前被理性主义所主导的现代主义，转向意大利现实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历史建筑。罗杰斯强调了对文脉的尊重，而阿尔甘则提出可以通过类型的使用来避免僵化的复古，同时也延续历史传统的丰厚内涵。阿尔多·罗西在《城市的建筑》一书中对类型理论给予了更充分的阐释。他指出“幼稚功能主义（naïve functionalism）”并不足以解释意大利历史建筑的演变，真正在历史中延续的不是确定的功能，而是建筑的类型特征。一座重要的历史建筑在数百年间会有很多功能的变化，但是其类型特征不会变化，它成了一个“城市纪念物”，成了“通过建筑原则表现的集体意志的符号”，^{[12]22}恰恰是这些纪念物，构建了人们对城市的认知与理解。对于罗西来说，这样的城市纪念物应该成为当代建筑的典范。通过对类型元素的使用，建筑可以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传递给人们充满历史厚度的意义内容。

而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被文森特·斯库利（Vincent Scully）称为勒·柯布西耶《走向一种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出版以来最重要的建筑著作，这可能是因为文丘里将自己的建筑立场与现代主义“清教徒式的道德语汇”对立了起来，在“非直白的建筑：一个文雅的宣言”（“Non-straightforward Architecture: A Gentle Manifesto”）一节中，文丘里将自己所推崇的“混杂、折衷、扭曲、模糊、包容”与正统现代主义的“纯净、清洁、平直、明晰、排斥”等特征直接对立起来。实际上，复杂性与矛盾性都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可以涵盖很多不同的方面，但文丘里最为注重的则是意义的复杂性，他写道：“我追求意义的丰富性（richness of meaning）而不是意义的清晰性；追求含蓄的功能而不是明确的功能。我喜欢‘兼与’而不是‘非此即彼’，喜欢黑与白，有时候是灰，而不是黑或者白。有效的建筑唤起多层次的意义，以及焦点的组合：它的空间与元素变得可以阅读，能够同时以各种方式运作。”^{[13]16}而在具体的建筑设计上，文丘里也看向了历史，只不过他更倾向于各种历史片段，而不是抽象类型，“通过非常规地组织常规成分，建筑师能够在整体中创造新的意义”^{[13]43}。这里的常规成分就是指具有确定内涵的传统元素，比如山墙、拱券、线脚。文丘里的母亲之家就是对这种设计原则最好的说明。在随后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中，文丘里与德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将大众文化与商业经营的符号与标记也纳入常规成分的范畴，但目的并没有改变，仍然是通过非常规的方式驾驭常规元素，以创造“意义的丰富性”。

在后一方面，很多专业研究者积极吸纳了符号学的研究成果，用以解析建筑如何传递意义。这主要还是受到

了索绪尔的影响。这位瑞士语言学家认为，不仅仅是语言具有特定规律与原则，其他的符号系统也有类似的特征，所以一种整体性的符号学研究可以对这些领域产生影响。很快他所提出概念体系，比如“语言-言语”“能指-所指”“句段关系-联想关系”等都被引入对建筑意义的讨论之中。在这一方面，意大利学者塞尔吉奥·贝蒂尼（Sergio Bettini）、乔瓦尼·克劳斯·柯尼希（Giovanni Klaus Koenig）以及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等人是重要的先行者。在英语学界，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与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已经借用语言学理论论证意义传递对建筑的重要性。这些努力于1969年在乔治·贝尔德（George Baird）与查尔斯·詹克斯编辑的《建筑中的意义》（*Meaning in Architecture*）一书中得到汇集。其中，詹克斯与更早之前的翁贝托·埃科一样，都强调意义的传递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需求，甚至是在满足建筑功能的过程中，都需要向使用者展现功能才能达成功能目的。这一观点与18世纪的“话语建筑”非常类似，只是在符号学的视角下，它可以从社会活动的更多层面获得支撑。詹克斯也与乔治·贝尔德一同借用了符号学的原则，比如以言语和语言的差异，以及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关系来讨论建筑如何更好地传达意义。

“差异”是索绪尔所强调的重要原则，他提出，符号与符号所指代的内容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是符号之间的差异使得符号可以指代一个特定的意义。^{[14]159-162}①这一强调与文丘里对矛盾性与复杂性的强调形成了共鸣。也是基于这一基础，查尔斯·詹克斯在此后的《后现代建筑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等著作中，将通过差异性的语汇来实现丰富的意义传递确立为后现代建筑最重要的特征。“如果想要他的作品按照设想的方式与人交流，建筑师必须赋予建筑过度的语汇，使用冗余的世俗标记与象征，这样才能在快速变化的语汇体系中幸存下来”^{[15]47}。而他所推崇的“激进折衷主义”不会像19世纪的历史主义那样拘泥于一种特定的风格，而是“使用全部的交流途径——比喻的、符号的以及空间的、形式的。与传统的折衷主义类似，如果合适的话，它会选择正确的风格，或者是其分支体系——但是一种激进折衷主义会将这些元素混合在一个建筑中。这样每种风格的语义色彩能够对应于最为接近的功能对等物”^{[15]47}。

伴随着后现代建筑在全球的扩散，“激进折衷主义”带来了多样性的后果。一方面后现代建筑对历史片段的借用的确给予建筑作品更多的可读性，比如可以在柱式、拱券、山墙上阅读出历史建筑的先例。但另一方面，缺乏原则的“折衷”也使得建筑成为大量历史片段的散乱集合，令人怀疑这样的符号堆砌到底是像文丘里和詹克斯所设想的那样带来更丰富的意义，还是说只是带来一组互不关联的片段，

无法形成整体性的信息。这提醒我们，意义问题除了关注是否要传递意义之外，另一个不可避免的核心是到底应该传递什么意义，由此才能决定如何传递意义。20世纪60年代的这些理论先锋们更多讨论了是否要传递意义这一问题，但是对于到底应该传递什么意义的问题并没有充分讨论。

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这些理论家的疏忽，更为真实的原因是在这个时代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是极为困难的，因为此前传统理论所依赖的两大意义源泉：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都已经不再具有权威，那么在这个被尼采宣称为“上帝已死”的虚无主义时代，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的意义源泉？这已经不只是建筑理论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也是整个当代社会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在20世纪末期，另一些理论先锋通过对意义的质疑，将这种挑战的严峻性在建筑理论中逐一展开。

3 对意义的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筑理论中对意义问题的关注是建立在对主流现代主义作出反馈的基础之上的。上文提到的批评者主要认为主流现代建筑缺乏意义表达，所以支持通过使用民间建筑元素、历史类型或者符号重新给予当代建筑以意义内容。但也有另外一些批评者给予了不同的分析，他们认为现代建筑并不缺乏意义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所传递的内涵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同样导致了现代建筑的危机。

后一种立场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国学者科林·罗（Colin Rowe），他在为《五位建筑师》（*Five Architects*）一书撰写的前言中进行了清晰的阐释。^②他认为现代建筑实际上也在传递一种意义内容，那就是一种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或者说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他写道：“（现代建筑）变成了一个更好世界的外在可见的符号，向当下宣示了未来将要揭示的东西；这里有一种前提，现代建筑是未来的推动者，越多的现代建筑被建造起来，理想的条件就越容易到来。”^{[16]74}但是此后的历史证明，这种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而像卡尔·波普（Karl Popper）与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等学者都明确地指出，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式整体社会理念是危险的，可能带来固化与排斥。所以欧洲现代建筑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传递了这种可疑的意义内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现代建筑并不具备这样的特性，它们“去除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内涵”，它们“没有受到政治推论的影响，也抛弃了那些很可疑的理念”^{[16]76}。在科林·罗看来，纽约五人继承了美国建筑的这一传统，他们专注于现代主义形式语汇的挖掘，而不是陷入对理想社会图景的指涉。

结合本文此前的分析，科林·罗所反对的并不是建筑要传递意义，而是说现代建筑所传递的特定意义——乌托邦的社会图景——并不正当，他所抵制的是意义的内容，

① 索绪尔在很多地方强调了差异在语言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② 《五位建筑师》一书是197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行第8次环境研究建筑师会议（CASE）之后，将五位纽约建筑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查尔斯·格瓦斯梅（Charles Gwathmey）、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以及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的作品结集出版而成的。这五位建筑师后来也被称为“纽约五人”。

而不是意义本身。那么是不是找到合理的内容，就可以接受建筑意义传递呢？逻辑上的确是这样，但在现实中这成为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因为当代社会已经没有像之前传统社会那样具有权威性的社会秩序可以依赖，所以建筑已经没有合理的内容可以传达。这一立场在美国建筑师与理论家彼德·艾森曼的论述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在 1984 年发表的《古典的终结：开始的终结，结局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一文中，艾森曼指出传统建筑理论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它们分别是表现、理性以及历史。每一个幻象都有一个暗藏的目的：表现是为了体现意义这一理念；理性是为了确立真理这一理念；而历史是为了在变化的理念中恢复永恒这一理念”^{[17]524}。在艾森曼看来，这三个基础都不稳固。比如，表现的终极对象是现实，但是现实本身是一个被构建出的对象，所以无法成为表现的稳定基础。至于理性和历史，也都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理性，历史也并不是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拥有统一的剧本。实际上，在这三个基础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最重要的对象，那就是人。艾森曼表示，传统理论认为人具有确定的本质，所以人的意义诉求、人的理性、人的历史演化可以成为建筑意义的基础。但是就像尼采、福柯等思想家所论述的，人实际上并不具有这样可以信赖的本质，与之相反，所谓的人的“本质”实际上是被各种知识、权力、组织体系构建出来的，它自身就是一个结果，而不是源泉，那么以人为基础的意义、理性、历史也都无法成为可以依赖的对象。建筑不能依靠它们，只能回到自身的形式演化。艾森曼借用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观点，认为建筑自身的形式组织原则可以独立于具体的意义传达而存在，就像人脑中先天的语言结构一样。

实际上，艾森曼对建筑形式自主性的论述是非常薄弱的，但是他从质疑人的本性出发，来质疑是否有合理的意义内容这一论述则是强有力的。在这一点上，艾森曼的观点也得到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主义思想的支持。德里达所倡导的“解构”（deconstruction）实际上是一种批判性的哲学分析，他指出一些哲学体系本身内在的矛盾，从而实现对该哲学体系的质疑或者颠覆。意义问题也是德里达解构分析的着力点之一。比如在《柏拉图的药》（“Plato's Pharmacy”）一文中，德里达质疑了古希腊哲学认为的言说比书写更为优越，理由是言说能更直接和准确地传递真理的观点。德里达的论据是，并不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直接呈现的真理，真理依然需要依靠语言这一媒介得以表达，所以言说和文本都只是通过中介实现的意义传递，它们都一样要受到中介的影响，所以也就不能被视为绝对的真理。德里达这一分析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比较言说与文本，而是想说明那种认为存在某种绝对的真理、本质、意义，它们可以被人清晰地认识和表述的观点是不成立的。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那种认为存在一种“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它可以用适当的概念和符号（signifier）精准呈现出来的观点，只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幻象。可以认为，德里达从认

识论的层面否定了绝对真理、本质、意义的存在，也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内涵是绝对可靠的，这自然也就包括了艾森曼所提到的，传统理论所依赖的表现、真理、历史。

解构主义思想因其对传统哲学体系的巨大冲击而迅速在整个人文领域扩展了影响。建筑理论界积极欢迎这种新的先锋思想。1988 年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解构主义建筑展”是最为典型的体现。虽然将参展建筑师联系在一起的更多是形式语汇上的革新，而不是共持的建筑理念，但是像彼德·艾森曼、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等参展建筑师的确持有与德里达接近的立场。他们都质疑传统建筑意义内涵的正当性，摆脱这些传统内容的限制，可以为建筑带来“僭越（transgression）”的愉悦，就像屈米所写的：“亢奋并不是来自于超越限度的数量的愉悦，而是产生于超越限度这一行为的愉悦。”^{[18]182}如果审视艾森曼的维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与屈米的拉维莱特公园等建筑，就会意识到它们的冲击力并不是来自于它们传递了什么肯定性信息，而是与之相反，这些建筑展现了对传统建筑意义内涵的质疑与颠覆。这样的作品，成了“解构”的建筑宣言。

除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之外，20 世纪中后期逐渐上升的批判理论也同样推动了对建筑传统意义内容的挑战。批判理论的支持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源于根本性的底层经济基础，这导致了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危机。所以，如果不能进行全面的经济基础的革命，那么任何上层建筑的活动都是徒劳的，它们不仅无法改善资本主义，反而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工具，帮助掩盖资本主义的问题，或者退缩到自己领域的“闺房”之中孤芳自赏。无论是这两种中的哪种情况，都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一悲观立场之下，传统建筑所表达的内容，都基本上被划归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ideology）的产物，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巩固自身的工具。所以在像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这样持有批判立场的理论家看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建筑的意义表达是徒劳的，“在这个体系中不再可能发现任何救赎：无论是不安地徘徊在图像的‘迷宫’之中——这些图像是如此多样以至于变得无趣和沉默，还是将自己锁闭在几何内容基于自身完美的阴沉静默之中”^{[19]28}。

可以看到，虽然出发点各有不同，但这些意义的质疑者们所持有的立场是近似的。他们所质疑的并不是建筑传递意义这一模式的合理性，而是在质疑是否有合理的内容可以被传递。传统的乌托邦理想、真理、历史、本质，以及文化在他们面前都无法经受严格的审视，那么建筑师是否还有可以信赖的内容去表现？这些质疑的实质，所针对的并不是建筑，而是人自身的处境，在今天这样的状态下，人们是否还能寻找到根本性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其他相关意义问题也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4 意义的还原

本文之所以用“意义问题”而不是“意义”这个词来

描述联系 20 世纪中期以来一些重要建筑思潮的线索，就是想体现这一线索的复杂性。虽然都是围绕着“意义”这一主题，但是相关的探讨延伸到政治、社会学、哲学的诸多层面。在意义问题中所折射出的，实际上是这一时期对建筑最深层理论基础的拷问。

对意义问题的探讨也继续延伸到 21 世纪初期，最近一部值得关注的论述是 2018 年出版、由瑞士学者与建筑师马克斯·布赖施密德（Markus Breitschmid）和瓦莱里奥·奥尔加蒂（Valerio Olgiati）合作完成的《非参照性建筑》（*Non-Referential Architecture*）一书。所谓“非参照性建筑”是指那种不再是“建筑之外某种东西的符号或者参照性容器”的建筑，^{[20]13}也就是不呈现建筑之外其他内容的建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能让很多人信服的理想。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足够稳固和强壮的参照性内容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世界中”^{[20]34}。这一论述并不难理解，比如，斯大林时期所推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就强调通过建筑来表现社会所共有的意识形态内容，但是这也造成了建筑创作一定程度的僵化。在两位作者看来，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再有这样统一的社会思想基础，所以不可能再出现类似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筑现象。从这点看来，作者的立场与艾森曼和德里达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就是并没有绝对可靠的内容来作为表现的对象。但不同之处在于，作者认为建筑虽然无法参照或者呈现外部的内容，但是可以依赖自己的品质来“创造意义（sense-making）”。作者使用了 sense 而不是 meaning 一词，是想体现“意义”这个概念的另一个层面。在常规理解里，“意义”主要被理解为符号所指代的内容，但是在另一个更抽象的层面，“意义”也有具有目的和价值，比如人们所说的“生活意义”就是指这个层面。布赖施密德与奥尔加蒂的观点实际上表明建筑无需作为符号去指代建筑之外的内容，建筑可以通过自身途径引导人们反思关于目的和价值的问题。这后一种可能性是值得信赖和求索的，因为“无论我们的社会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保持不变的，是我们需要存在的避风所，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也是形而上学上的”^{[20]66}。他们所说的“创造意义”，就是指建筑引导我们思考人如何实现具有价值和目的的存在。

上述《非参照性建筑》中的这段话有着强烈的现象学背景。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这样的哲学家看来，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要从人的存在这一因素开始探讨，作为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存在也就是第一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所以，对人的存在的价值与目的进行探讨，就是现象学视角下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有的读者可能会疑惑，这种哲学层面的“意义”与之前讨论的符号性的“意义”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如何能整体放在“意义问题”的范畴中讨论？对于这一问题，现象学有清晰的答复，人的存在是由各种有目的性的活动一同构成的，这是先决条件，正是在有目的的活动中，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概念、符号、语句，其作用是帮助实现目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以交通信号为例进行了说明：“一个符号是一种工具，它是在手边备好的（ready to hand），服务于驾驶员的驾驶活动，而且不只是为

了驾驶员，那些没有在车里的人也在手边备好的事物——有时是专门服务于他们，要么是通过让出道路一边，要么是停下来。符号是在世界中（within-the-world）的手边备好的事物，它存在于由车辆与交通规则组成的整体性的工具—背景之中。”^{[21]109}所以，符号性的“意义”是依附于作为价值与目的的“意义”的，在人的存在之中，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部分。换句话说，符号性的“意义”实际上来源于作为价值与目的的“意义”，只有后者有值得信赖的内容，符号性的“意义”也才有值得信赖的内容。所以要在最深的层面讨论意义问题，就必须还原到作为价值与目的的“意义”。

由此回到上文留下的问题，到底是否还有值得信赖的内容来予以表达？在现象学视角下，这一问题转化为到底是否还有信赖的价值与目的值得人们在自己的存在中追寻？如果有，那么这种哲学层面的“意义”就可以为符号性的“意义”提供支撑，而如果没有，那么就会得到与质疑者类似的悲观结论。

这可能是当代哲学面对的最为艰难的挑战，很难说有哪种哲学理论很完美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就像新西兰哲学家朱利安·扬（Julian Young）所阐述的，自从康德将人自身放在整个现象世界的中心，价值与目的的问题就成为当代哲学最沉重的负担。从叔本华到德里达，各种各样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哲学尝试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22]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可能是所有这些尝试中最富有价值的，他提出将“安居（dwelling）”作为终极的价值与目的，而“安居”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自身得到庇护，比如建筑为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另一方面，人也要关怀和保护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可能性的源泉，^{[23]353}比如通过建筑表达对物、对大地、对世界以及对神秘源泉的尊重。

20 世纪后半期的很多理论都与这一现象学背景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诺伯格-舒尔茨对“场所精神”的论述，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对批判性地域主义以及建构理论的阐释，以及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对建筑氛围与物性的理解等。实际上，前文提及的阿尔多·凡·艾克对“意义”的探讨也属于这一层面。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海德格尔，但是像“无论空间与时间意味着什么，地点与时刻的意义都更为丰富。因为在人的图景中，空间就是地点，时间就是时刻”^[24]。这样的话语体现出浓厚的现象学倾向。他所强调的“建造意义”并不是为建筑添加符号，而是提倡建造能够显示人们理想的价值与目的的建筑，而这也是其他与现象学立场相近的建筑思潮的共同目标。

可以认为，这些建筑师与理论家们认为可以在现象学的哲学理论中找到对意义质疑者们的回应。“安居”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存在理想，所有能够促进“安居”的内涵都是值得表现的。而他们所面对的拷问是“安居”是否真的具有价值，它如何具体化，以及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是否可能实现“安居”。布赖施密德与奥尔加蒂的《非参照性建筑》一书就是对这种拷问的回应，他们认为即使社会整体缺乏稳定的价值基础，建筑也可以通过特有的手段，比如空间体验、一体性、构筑、冲突、秩序等，引导哲学思考，引向“创造意义”。在这个层面上看，“意

义”不仅仅可以通过符号来直接表现，也可以通过间接性地启发人们的反思来实现。这实际上极大地扩展了提升建筑“意义”的手段，地域传统、材料、建构文化等都成了“意义”的桥梁。

对于这些具有现象学倾向的建筑师与理论家来说，拥有作为价值与目的的“意义”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前提之一，所以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对这种“意义”的探讨不仅是哲学的根本任务，也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和终极的问题。这也说明了为何“意义问题”会变得那么重要，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选项，而是对存在进行反思所不可避免要面对的挑战。从这一现象学视角来看，“意义问题”成为建筑理论的核心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仅是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这一段时间，甚至在任何时间它都应该是建筑理论研究的核心。如果审视从维特鲁威到现在意义问题的不断浮现，这样的观点似乎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然这也不会是意义问题的终点，就像有很多人并不认为现象学能够解答关于存在价值与目的的终极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建筑意义就此获得了根本性的解释。在可见的将来，意义问题仍将持续存在下去，继续激发人们关于建筑理论的探讨。

5 结语

在上面的文字中，本文简要地介绍了20世纪中期以来

一些主要的建筑思潮是如何与“意义问题”产生关联的。如果这些论述有其合理性，就可以认为这些不同的理论思潮的确能够通过这一线索串联起来。更重要的是，可以将这些思潮看作对意义问题不断深入的摸索，从最初将意义重新带回主流的建筑话语，到之后对是否还有可以信赖的意义内涵的反省，再到将意义还原到哲学基础，一些理论家在现象学理论中寻求哲学支持。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意义问题的根本实际上还是人的问题，是人需要意义，是人因为找不到价值与目的而苦恼，也是人通过哲学反思来不断探寻答案。所以，意义问题是典型的人文主义问题，它展现出建筑自身的人文色彩。

在这一背景下，意义问题可能会在近期再次凸显出来，这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如何认识自己带来了巨大震动。以前认为人所独有的能力，比如对自然语言的驾驭、绘画、内容生成都被证明可以被计算机神经网络所掌握，那么人与机器之间是否真的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或者说人只不过是一个更为复杂一些的神经网络模型而已？这些问题的解答牵涉到对人、对价值与目的、对意义的根本性认知，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建筑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有可能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将人们带到比现象学更为深入的层次审视，引发对人的根本特性再次展开最原初的思考，而这到底是带来意义的肯定还是意义的瓦解，可能会是未来建筑学理论面对的最困难的抉择。

参考文献

- [1] VITRUVIUS P, HOWE T N, ROWLAND I D.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 ALBERTI L A. On the Art of Building in Ten Books[M]. Rev.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 [3] COOPER D E. Aesthetics : the Classic Readings[M]. Oxford: Blackwell, 1997.
- [4] SULLIVAN L H. Kindergarten Chats and other Writing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9.
- [5] VAN DOESBURG T. Towards Plastic Architecture[M]//MALLGRAVE H F, CONTANDRIOPOULOS C. Architectural Theory (Vol 2): An Anthology from 1871 to 2005. Oxford: Blackwell, 2007: 188-190.
- [6] LOOSA A. Ornament and Crime[M]//MALLGRAVE H F, CONTANDRIOPOULOS C. Architectural Theory (Vol 2): An Anthology from 1871 to 2005. Oxford: Blackwell, 2007: 104-105.
- [7] ROWE C, SLUTZKY R. Transparency: Literal and Phenomenal[M]//ROWE. 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IT Press, 1976: 159-183.
- [8] MALLGRAVE H F, CONTANDRIOPOULOS C. Architectural Theory (Vol.2): An Anthology from 1871 to 2005[M]. Oxford: Blackwell, 2007.
- [9] OCKMAN F, EIGEN E. 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A Documentary Anthology[M]. New York: Rizzoli, 1993.
- [10] VAN EYCK A. The Child, the City and the Artist[M]. Amsterdam: Sun, 2008.
- [11] VAN EYCK A. Built Meaning[M]//LIGTELIJN V, STRAUVEN F. Collected Articles and other Writings 1947—1998. Amsterdam: Sun, 2008: 470.
- [12] ROSSI A.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2.
- [13] VENTURI R.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M]. 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Ltd., 1977.
- [14]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5] JENCKS C.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M]. 6th ed.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91.
- [16] ROWE C. Introduction to Five Architects[M]//HAYS M.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8: 72-85.
- [17] EISENMAN P. 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M]//HAYS M.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8: 522-539.
- [18] TSCHUMI B. Architecture and Transgression[M]//MALLGRAVE H F, CONTANDRIOPOULOS C. Architectural Theory (vol 2): An Anthology from 1871 to 2005.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448-450.
- [19] TAFURI M. Toward a Critique of Architectural Ideology[M]//HAYS M.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Cambridge, Mass.: MIT, 1998: 2-35.
- [20] BREITSCHMID M, OLGIATI V. Non-referential Architecture[M]. Basel: Simonett & Baer, 2018.
- [21]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M]. London: SCM Press, 1962.
- [22] YOUNG J. The Death of God and the Meaning of Life[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23] HEIDEGGER M.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M]//KRELL D F. Basic Writings.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1993: 343-364.
- [24] VAN EYCK A. There is a Garden in Her Face[M]//LIGTELIJN V, STRAUVEN F. Collected Articles and other Writings 1947—1998. Amsterdam: Sun, 2008: 293-294.